

基于系统视角的
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研究

杨建春著



科学出版社

基于系统视角的民族村寨 旅游发展研究

杨建春 著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通过对国内外民族村寨旅游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在民族学、经济学、旅游学等相关学科理论指导下,采用系统分析、比较分析、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等方法,基于系统的视角,运用一般系统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理论等系统科学理论对民族村寨旅游发展进行研究,探索民族村寨旅游可持续的协同发展路径。

本书适用于研究旅游管理、旅游经济、民族经济的研究人员参阅,也可供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学生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于系统视角的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研究 / 杨建春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7. 2

ISBN 978-7-03-051820-0

Ⅱ. ①基… Ⅱ. ①杨… Ⅲ. ①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旅游业发展-研究
Ⅳ. ①F590.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32454 号

责任编辑: 郭勇斌 周 爽 欧晓娟 / 责任校对: 邹慧卿

责任印制: 张 伟 / 封面设计: 蔡美宇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教图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7 年 2 月第 一 版 开本: 720×1000 1/16

2017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2 3/4

字数: 242 000

定价: 7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序 言

随着我国旅游业快速发展和旅游市场快速增长,人们的旅游需求也日趋多样化。我国很多民族村寨周边生态环境优越,拥有丰富多样且风光优美的山地田园风光,留存了各具特色且极具观赏价值的民族村寨建筑,还保留了独特的民族习俗、民族节庆活动等人文旅游资源,这些都吸引了很多游客到民族村寨欣赏美丽的村寨景观、探访独特的民族文化、感受质朴的民风民俗,民族村寨旅游迅速成为一种旅游时尚。

我国的民族村寨多位于偏远地区,这些区域生态环境脆弱,交通不便,生产力水平低,人口集聚和经济集聚效应低,不适合通过大规模发展工业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和增加当地居民收入,这些区域的民族村寨居民长期以来基本依靠农牧业勉强维持生计,当地政府也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拨款维持区域经济社会的各项工作。这些地区的居民和当地政府长期面临如何发展区域经济,通过什么途径增加就业机会和当地居民收入的困扰。

民族村寨旅游的兴起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居民增收带来新的机遇。大量游客到民族村寨旅游为这些旅游村寨及其周边的居民带来很多就业机会和远超农业收入的经济收益,区域内旅游相关产业也得以被拉动发展、区域经济快速增长,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也有了新的来源。很多民族村寨通过发展旅游业摆脱了原本困扰当地居民和当地政府多年的贫穷落后问题,越来越多具有发展旅游条件的民族村寨把发展旅游业作为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作为我国民族地区特定的经济文化空间,民族村寨旅游具有特殊的意义。

贵州省是我国民族村寨旅游发展较早的省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充分利用区域丰富的民族文化旅游资源,选择一些景观较好且特色建筑保存较完整、民族习俗和民族传统文化保持较好、具有一定交通和区位优势的民族村寨作为旅游开发实验点,成功打造了贵州黔东南的郎德上寨、西江千户苗寨等闻名国内外的民族旅游村寨。经过30多年的发展,无论是贵州的民族村寨旅游还是全国的民族村寨旅游,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然而,目前我国民族村寨旅游发展中所出现的各种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问题日益凸显,不利于民族村寨经济持续增长、民族文化遗产和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这些问题已经成为我国民族村寨旅游发展地区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现实课题,并且引起了民族地

区地方政府和旅游界人士广泛关注,也成为旅游研究领域值得探讨的重要学术研究问题。

民族村寨旅游可持续发展是一项经济、社会和生态整体协调发展的复杂系统工程,关系到民族村寨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等多种要素的整合协调。对民族村寨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也应该对其所涉及各要素的演化规律及各利益主体的行为特征等方面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以便据其独特的运行规律和演变特征制定科学合理的民族村寨旅游开发和管理策略,促进其可持续发展。本书作者以促进民族村寨旅游经济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均衡可持续发展为目的,以民族学、经济学、旅游学等多学科知识和研究方法为指导,站在全面整体的高度,基于系统视角,构建了民族村寨旅游系统的整体构架,综合运用一般系统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理论等系统科学理论研究民族村寨旅游系统的整体特征和运行规律;并依据构成民族村寨旅游系统主体的村民具有的“经济-文化人”双重属性,以“经济-文化人”假设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探讨了民族村寨旅游系统运行的特殊性。针对目前民族村寨旅游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如何实现产业经济增长、生态环境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等各方面均衡持续发展,如何保障各利益相关主体的利益均衡等一系列关键问题,作者从规划与统筹发展策略、制度化建设与监督途径、各利益主体的利益保障机制、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措施、旅游市场扩大与服务质量提升对策、投融资途径拓展及多层次产品开发途径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民族村寨旅游系统协同发展的途径及对策建议。这种系统性、整体性、多角度、多学科知识融合研究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不但为民族村寨旅游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拓展了民族村寨旅游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而且在民族村寨旅游开发和管理的实践工作中,如果借鉴该书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将更易于深入、全面地理解民族村寨旅游发展中呈现出的各种特征和运行特点,准确地把握民族村寨旅游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关键症结,从而科学地制定解决民族村寨旅游现存诸多问题的对策。

本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注重点面结合,既注重应用研究也注重理论研究,强调定性研究的同时也重视定性 with 定量研究相糅合,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不仅对发展和丰富民族学、经济学、旅游学理论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优化民族地区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保护生态环境、宏扬民族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本书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也显示出作者善于思考,勇于创新的精神。作为杨建春的博士生导师,我为他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欣慰,故欣然为之作序,希望他今后取得更加突出的成绩。

刘晓明

2016年12月30日

目 录

序言

1 绪论	1
1.1 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的现实问题及本书的研究意义	1
1.2 相关学术研究综述	5
1.2.1 民族村寨旅游与民族旅游、乡村旅游的关系	5
1.2.2 国外对民族村寨旅游的研究	6
1.2.3 国内对民族村寨旅游的研究	13
1.2.4 民族村寨旅游研究述评	21
1.3 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	22
1.3.1 研究对象的选取	22
1.3.2 研究内容	23
1.4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24
1.4.1 研究框架	24
1.4.2 研究方法	24
2 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的相关理论基础	28
2.1 系统科学理论	28
2.1.1 一般系统论	28
2.1.2 耗散结构理论	31
2.1.3 协同理论	34
2.2 旅游系统理论	36
2.2.1 旅游功能系统模型	37
2.2.2 旅游空间系统模型	38
2.2.3 旅游耗散结构系统模型	39
2.3 旅游可持续发展理论	40
2.3.1 可持续发展的含义	40
2.3.2 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41
2.4 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研究的逻辑起点	42
2.4.1 民族文化观念对村民经济行为的影响	43

2.4.2	民族村寨旅游业具有经济和文化双重属性	44
3	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的现实探索	46
3.1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的背景分析	46
3.1.1	贵州少数民族概况	46
3.1.2	贵州民族村寨经济社会发展分析	47
3.1.3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资源的特色	50
3.1.4	贵州民族村寨发展旅游的原因分析	55
3.2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的发展历程	57
3.3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效应分析	60
3.3.1	民族村寨旅游经济效应	61
3.3.2	民族村寨旅游社会效应	66
3.3.3	民族村寨旅游文化效应	73
3.3.4	民族村寨旅游环境效应	75
3.4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	78
4	民族村寨旅游系统分析	82
4.1	民族村寨旅游系统的结构及内涵	82
4.1.1	旅游系统的概念	82
4.1.2	民族村寨旅游系统的概念、结构及特性	83
4.2	民族村寨旅游的客源市场系统分析	86
4.2.1	民族村寨旅游客源市场系统结构分析	86
4.2.2	民族村寨旅游需求分析	90
4.3	民族村寨旅游的通道系统分析	94
4.3.1	民族村寨旅游交通通道子系统分析	94
4.3.2	民族村寨旅游信息通道子系统分析	98
4.4	民族村寨旅游地系统分析	101
4.4.1	民族村寨旅游地系统的结构	102
4.4.2	民族村寨旅游地系统的特点	103
4.4.3	民族村寨旅游地承载力分析	104
4.5	民族村寨旅游支持系统分析	107
4.5.1	民族村寨旅游制度子系统分析	107
4.5.2	民族村寨旅游技术子系统分析	110
4.5.3	民族村寨旅游教育培训子系统分析	111
5	耗散结构理论视角下民族村寨旅游系统运行研究	112
5.1	民族村寨旅游系统负熵的引入	112
5.1.1	民族村寨旅游系统自然过程的负熵引入	112

5.1.2	民族村寨旅游系统经济过程的负熵引入	113
5.1.3	民族村寨旅游系统社会过程的负熵引入	123
5.1.4	民族村寨旅游系统文化过程的负熵引入	126
5.2	民族村寨旅游系统的非线性动态演化	132
5.2.1	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	133
5.2.2	民族村寨旅游系统演化的 Logistic 曲线模型	135
5.2.3	郎德旅游发展的非线性动态演化	139
6	民族村寨旅游系统协同发展研究	145
6.1	协同理论视角下民族村寨旅游系统发展分析	145
6.1.1	民族村寨旅游系统协同发展原理	145
6.1.2	民族村寨旅游系统序参量协同模型	147
6.1.3	民族村寨旅游系统发展模式	148
6.2	贵州省民族村寨旅游系统发展模式实证研究	149
6.2.1	旅游经济序参量主导型	149
6.2.2	生态环境-社会文化序参量主导型	155
6.2.3	生态环境-社会文化-旅游经济序参量协同主导型	157
6.2.4	比较分析	160
6.3	民族村寨旅游系统协同发展机制	160
6.3.1	利益协调机制	161
6.3.2	政府主导机制	163
6.3.3	社区参与机制	164
6.3.4	旅游产业化推动机制	166
6.4	民族村寨旅游系统协同发展途径及对策建议	167
6.4.1	民族村寨旅游系统协同发展途径	167
6.4.2	民族村寨旅游系统协同发展对策建议	170
7	结论及展望	173
7.1	本书结论	173
7.2	本书创新之处	175
7.3	本书研究不足及展望	176
	参考文献	177
	后记	191

1 绪 论

1.1 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的现实问题 及本书的研究意义

经过 60 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两大差距:

一是城乡差距(图 1-1)。1978 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村生产关系变革影响重大,使农村经济中被旧有计划经济体制所压抑的巨大能量得以短时间内迅猛爆发,农村经济空前发展^[1]。尽管如此,由于种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三农”问题接踵而至:①农业基础薄弱;②农民收入增长缓慢;③农村面貌落后。在此背景下,虽然农村居民收入在逐年小幅提升,但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却有逐步加大的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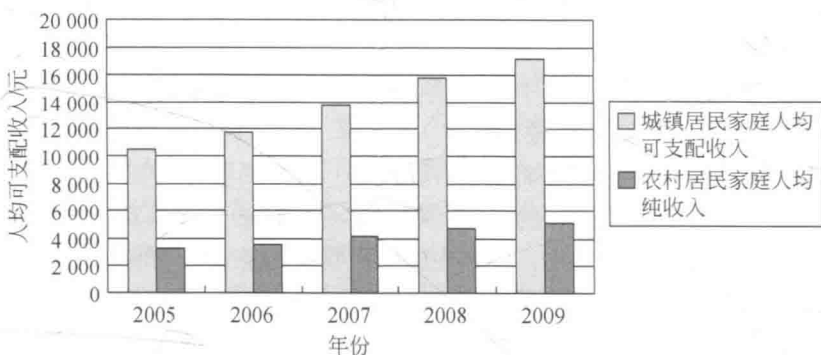


图 1-1 城乡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比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6~2010)

二是东西部差距(图 1-2)。我国经济发展呈东西地带性差异,表现为东部经济的快速增长和西部经济的迟缓爬坡,有学者指出“从民族关系上看,其实质就是东部以汉族为主的聚居区和西部以少数民族为主的聚居区的差异”^[2]。由于

自然和历史等多方面原因,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面临诸多问题和困难,明显滞后于东部发达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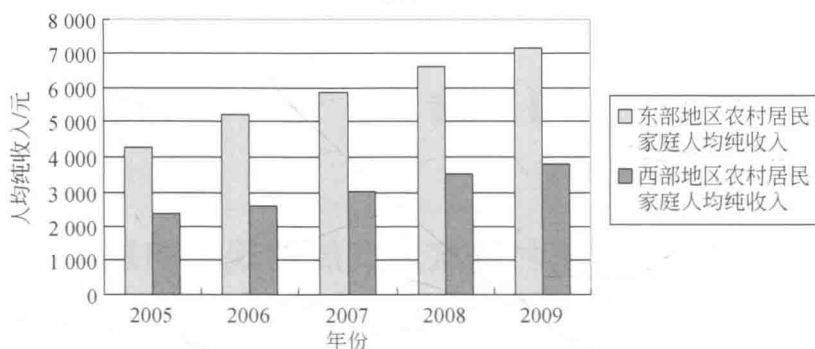


图 1-2 东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对比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6~2010)

2000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少数民族人口为 10 643 万人,占总人口的 8.41%。其中,少数民族乡村人口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比例为 76.64%;西部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比例为 71.92%^[3]。由此可见,我国民族地区主要位于西部,并且大部分少数民族人口居住在农村。因而民族村寨的发展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及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旅游业作为关联度高、就业门槛低的产业,具有综合带动性强、辐射牵引力大的特点。发展旅游业,有助于转移农村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多元化、农村乡风文明的建设,保持农村的村容整洁,对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大意义。2006 年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全国旅游工作会议上强调:“旅游行业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部署,以旅游促‘三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贡献。”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以下简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比较落后,社会发展程度较低,却有着原始纯朴的自然环境、雄奇独特的天然景观、古老神秘的历史遗迹、风格迥异的民族文化,堪称中国乃至世界的旅游资源宝库。民族地区旅游资源优势集中体现在其丰富多样性、不可替代性、原始神秘性等方面,不仅品位高、垄断性和独特性强,而且由于受人为破坏较少,大多保留着未经雕饰的原始风貌,符合世界旅游“求新、求异、求乐、求知”的需求和趋势,具有强烈的吸引力^[4]。

作为民族地区旅游资源之一的民族村寨,一方面是民族地区农村的基本社区,由于位置偏远、交通不便等原因长期封闭、鲜于对外交流,受现代文化和都市生活的影响较少,保留着发达地区难以企及的自然环境和自然景观。另一方面,民族村寨也是传承少数民族文化的基本空间载体。民族村寨除了具有优美的

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亦颇为独特,不仅保存着从渔猎、采集到畜牧、农耕等人类历史上不同阶段的生产、生活方式,而且展现出不同类型的信仰、习俗、节庆、仪典、音乐、歌舞、语言、文字、建筑等各具特色的民族传统文化。正是由于民族村寨能够全面、系统、集中、原生态地展示地方民族传统文化,故极具旅游开发价值。

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和旅游业的纵深发展,旅游者的旅游需求不断更新,民族村寨旅游成为许多“求新、求异、求乐、求知”的游客的选择。因此,民族村寨旅游成为当今旅游开发和游客选择的新热点。从1992年的“少数民族风情游”到1995年的“中国民俗风情游”;从1998年的“华夏城乡游”到2006年的“中国乡村游”,再到2007年的“中国和谐城乡游”,民族村寨旅游的浪潮是一浪高过一浪。

很多民族地区的村寨迫切需要通过产业转型寻求新的发展道路,部分民族村寨依靠各自的民族文化特色或村寨周边的自然旅游资源,加大了旅游开发的力度,形成了一大批全国知名的民族村寨旅游景点。诸如贵州的郎德上寨、西江千户苗寨、六枝梭嘎苗寨、黎平肇兴侗寨,四川的桃坪羌寨、甲居藏寨,云南的泥戈哈尼族村、大沐浴傣族村、雨崩藏族村,以及湘西的德夯苗寨,等等。多年的实践证明,对于民族地区而言,大力发展民族村寨旅游,在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农民劳动就业、改善农民生活质量、促进农业升级、保护生态环境和弘扬民族文化等方面有着积极的推进作用。

正在逐步蓬勃兴起的民族村寨旅游,在为民族地区经济注入生机和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可小觑的负效应。民族村寨旅游资源的利用如果不是立足于对文化和环境的保护性发展,而是只一味追求经济效益的掠夺式开发,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发扬将带来毁灭性打击。目前民族村寨旅游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存在的“重规模、轻效益;重本位、轻协调;重利用、轻保护”做法,使一些民族村寨旅游发展表现出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强的问题,部分民族村寨甚至产生了“反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资源破坏、文化损伤、环境脆化、利益纷争、管理滞后等问题日益成为阻碍民族村寨旅游进一步发展的绊脚石。

民族村寨旅游发展,既有一般乡村旅游发展的共性,又在其经济文化内涵之中蕴藏着特殊性。围绕民族村寨旅游活动出现的文化变迁和环境变化不是由某个单一特定因素所引起,而是取决于一系列的社会、文化、经济和环境因素。民族村寨和旅游发展之间存在的复杂双向互动关系,迫切需要引入相关理论来彻法底源,条分缕析之后提出治理方案。因此,笔者尝试基于系统视角来研究我国民族村寨旅游的相关发展问题:运用系统的观点去理解民族村寨、旅游业和可持续发展三者之间的长期动态影响模式,采取系统的方法解决潜在的社会、文化、经济和生态问题。研究视角放大至整个民族村寨系统,而不仅仅局限于其中的某一节

点；注重探析民族村寨系统的内涵变化，而不拘泥于外延增减。如何将系统理论与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相结合，这既是一个实践问题，又是一个理论问题，值得深入探究。

民族村寨属于小型社区，尽管规模小，但却完整地包含着“社”（即社会生活）和“区”（即人群地域分布与聚集）的基本内容和相互关系，从最基本的方面具体、直观、完整地体现着人类共同经营社会生活的组织结构和活动规律，反映着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一般格局^[5]。诚如费孝通先生指出的：“以全盘社会结构的格式作为研究对象，这对象并非不能是概然性的，因为联系着各个社会制度的是人们的生活，人们的生活是有时空的坐落，这就是社区。”^[6]每一个社区有它一套社会结构和各制度配合的方式，对这样一个小的社会单位进行深入研究而得出的结论并不一定适用于其他单位。但是，这样的结论却可以用作假设，也可以作为在其他地方进行调查时的比较材料。这就是获得真正科学结论的最好方法^[7]。

鉴于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的实践是先于理论出现的，目前学术界对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的理论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本书通过对国内外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并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在民族学、经济学、旅游学等相关学科理论指导下，采用系统分析、比较分析、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等方法，基于系统的视角，运用一般系统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理论等系统科学理论对民族村寨旅游发展进行研究，以探索民族村寨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协同发展路径。

本书的研究路径是由行到知再回到行的多个实践—理论周期，研究意义体现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

本书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一是尽管目前民族村寨旅游研究正逐渐成为热点，但理论研究相对薄弱，总体来看，对此领域的研究仍处于起步的阶段。本书运用多学科的相关理论，基于系统视角对民族村寨旅游进行研究，以丰富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研究的学科体系；二是本书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民族村寨旅游发展进行探讨，突破了传统仅从单一方面分析的局限性，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积累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以拓宽该领域的研究视野；三是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收集到的数据分析处理，研究变量的内在联系和变化规律，有利于增强民族村寨旅游定量研究的薄弱环节。

本书研究的实践意义在于：首先以民族村寨旅游发展作为解决民族地区“三农”问题的一个突破口，对民族地区增加农民就业机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优化农村产业结构、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促进民族和谐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其次民族村寨旅游发展对进一步保护生态环境和弘扬民族文化，优化民族地区经济结构和旅游产品结构都将发挥积极的作用；最后通过对贵州省民族村寨旅游的案例研究，总结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的相关经验，探索民族村寨旅游

发展的规律及其趋势,为贵州省政府相关部门发展民族村寨旅游提供决策依据,也为其他民族地区发展民族村寨旅游提供参考借鉴。

1.2 相关学术研究综述

1.2.1 民族村寨旅游与民族旅游、乡村旅游的关系

民族社区既可以是一个民族聚居的较大区域,也可以是一个民族聚居的村寨,或是一个民族相对集中的城镇,甚至可以是一个民族较为集中居住的街区。一个个民族聚居地、村镇和街区,往往是历史上形成的一个个民族的“共同地域”,就是一个民族的人们长期共同生活,形成各种内部联系的空间条件^[8]。

民族村寨作为民族社区的一种类型,其民族传统文化通过民族村寨的建筑、构筑物、传统工艺品、服饰、家居、饮食等物化形态的民俗,以及生产过程、人生礼仪、岁时节日、信仰、歌舞、游戏等非物化形态的民俗得以全面、系统、集中、原生态地展示。

我国的民族村寨旅游主要有两种形式:实地展示型和异地仿制型。实地展示型民族村寨旅游就是在少数民族聚居区选择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单个村寨发展旅游业,向游客展现其民族的现实生活状况。实地展示型民族村寨旅游的特点是能将民族文化真实自然地展示在其原生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它的优点是保留了原生的自然风貌、民居建筑、饮食、节庆和其他民俗事物,能较好地满足旅游者欣赏和体验异族文化的需要,如贵州省黔东南州雷山县郎德上寨的民族村寨旅游。异地仿制型民族村寨旅游是指在原生环境之外的地方,因博览、旅游等经济目的而将各民族的民居建筑、民间艺术和民族风情仿制、集中于新打造的村寨或主题公园等民族文化旅游景区,向游客多角度、多层次地展示少数民族文化的大型文化旅游景区或主题公园,如深圳的中国民俗文化村^[9]。本书的研究范围限定于实地展示型民族村寨旅游。

民族旅游(Ethnic tourism)在国外被称为 Aborigina tourism(土著民旅游)或 Indigenous tourism(原住民旅游),是一种根据当地人口社会文化特征来命名的旅游形式。我国台湾地区称其为异族观光^[10]。民族旅游指人们以观赏、领略、感悟、探索民族文化、民族社区甚至民族共同体为主要目的的旅行和暂时停留中所进行的物质与精神活动的总和。民族旅游资源按民族社区分类可分为城镇和村寨两个亚类^[11](表 1-1)。

表 1-1 民族旅游资源分类系统表

类	亚类	基本类型
民族社区	城镇	中心城市、特色城镇、特别街巷、传统建筑、遗迹遗址、公共设施、接待设施、社会风气、名胜生态环境
	村寨	乡土建筑、遗迹遗址、公共设施、接待条件、特色村寨、村规民约、传统民风、生态环境、风景、农林牧副渔业场景、村容村貌、典型家庭

因此，与民族村寨旅游相比，民族旅游包括的内容更为广泛。从旅游资源的角度尤其是旅游的核心吸引物来看，民族村寨旅游属于民族旅游的范畴。

乡村旅游指在乡村地区开展的，以特有的乡村人居环境、乡村民俗（民族文化、乡村田园风光、农业生产及其自然环境为基础的旅游活动，即以具有乡村性的自然和人文客体为旅游吸引物的旅游活动。以具有乡村性的自然客体为吸引物的旅游活动属于环境旅游范畴，以具有乡村性的人文客体为吸引物的旅游活动属于文化旅游范畴。因此，乡村旅游包括了乡村性的环境旅游和乡村民族文化旅游。在某一乡村地区开展乡村旅游活动，活动内容究竟是以环境旅游为主，还是以文化旅游为主，取决于该地区的本质特征^[12]。客源地的城市性（Urbanity）与目的地的乡村性（Rurality）级差或梯度是乡村旅游的动力源泉，乡村旅游生存的基础是乡村性或乡村地格（Rural placeality）。乡村性是乡村旅游的中心和独特的卖点^[13]。从旅游目的地的地理区位来看，绝大多数民族村寨处于山高路远、交通不便的偏远乡村；从客源角度来看，目前我国的民族村寨旅游游客主要是来自城市。因此，从旅游目的地的地理区位和客源角度看，民族村寨旅游又具有乡村旅游的特点，可归为乡村旅游的范畴。

综上所述，民族村寨旅游既有乡村旅游的特点又有民族旅游的属性。民族村寨旅游与民族旅游和乡村旅游之间表现出以下交叉关系（图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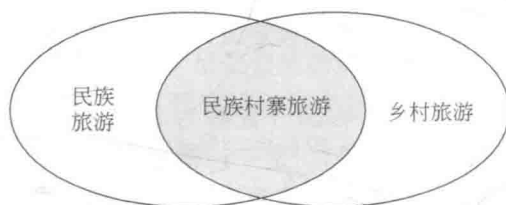


图 1-3 民族村寨旅游与民族旅游、乡村旅游关系示意图

1.2.2 国外对民族村寨旅游的研究

国外针对民族村寨旅游研究的文献较少，关于民族村寨旅游的研究主要基于

民族旅游和乡村旅游这两大概念背景下进行,在文献中一般以案例的形式出现。

1.2.2.1 民族旅游研究背景

从民族旅游研究背景来看,国外对民族旅游的研究,多与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紧密结合。社会学和人类学是两个密不可分的主导学科,两者的结合,为旅游人类学的出现创造了条件^[14]。人类学者进入旅游领域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Nunez发表的一篇有关墨西哥乡村周末旅游的文章,分析了周末旅游对当地居民生活方式、社会关系等方面的影响^[15]。而在1977年出版的由Smith主编的《东道主与游客:旅游人类学》一书,则被视为旅游人类学研究的里程碑。Smith根据不同旅游目的地提供的旅行体验的类型对旅游进行分类,民族旅游是其中的一种。她认为民族旅游是指以观察异国民众文化及生活方式为目的的旅游。比如,去巴拿马旅游,研究那里的圣布拉斯印第安部落;去印度旅游,观察生活在世外桃源的阿萨姆部落。这种类型的旅游活动一般包括参观当地土著的家、跳舞、出席一些仪式、参加一些宗教礼仪活动等^[16]。国外的民族旅游包括两种情形:一种是到土著民族居住的地区旅游,这些土著民族多指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土著民族,也包含发达国家保护区的土著民族;另一种是到从其他国家或地区迁徙而来的移民集中生活的社区旅游,他们是在迁入国处于非主流地位的民族成员^[17]。从研究视角来看,国外对民族旅游的研究主要从“游客”和“旅游地”这两个切入点出发;从研究内容来看,国外对民族旅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族旅游者、民族旅游的真实性、民族旅游中的“主-客”关系、民族旅游对目的地的影响等方面。

1) 民族旅游者

研究民族旅游者,主要目的是为探寻民族旅游的原因及其本质,国外学者主要通过研究旅游者体验与旅游者类型来接近这个目的。MacCannell认为游客与朝圣者在追求真实经验的心态上没有差异,所不同的是朝圣者拜访的地点与宗教有关,而游客则亲自到旅游目的地体验当地社会、历史与文化。在旅游的过程中,游客对真实性的追求程度表现在融入旅游地的生活、看当地人日常的生活方式、了解当地人的后台生活,或以冒险的态度进入当地的后台地区或生活^[18]。Graburn认为旅游是一种“现代的仪式”,是使人摆脱日常生活的行为模式,进行必要的休息的一种活动。这样,旅游者摆脱了日常现实社会生活的单一行为模式,主动进入到另一种新鲜的生活之中^[19]。Cohen认为对于不同动机的旅游者而言,他们渴望不同模式的旅游体验^[20]。国外学者主要从心理和行为特征两个方面对民族旅游者进行分类(表1-2)。

表 1-2 民族旅游者类型及其特征^[21]

研究学者	民族旅游者类型	民族旅游者特征
Moscardo 和 Pearce (1999) ^[22]	关系型旅游者 学习型旅游者 参与型旅游者 猎奇型旅游者	对民族旅游的各种活动内容都很有兴趣 对了解民族文化最有兴趣 对民族食品、手工艺品和民俗活动具有较高的兴趣 对民族文化兴趣的程度最低
Hughes (1995) ^[23]	后工业旅游者 后现代旅游者	关注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和真实性 追求个性化的旅游体验
Stebbins (1996) ^[24]	大众旅游者 特殊旅游者	探寻不同的民族文化 仅对某类民族文化有游客兴趣,甚至会重复访问

2) 民族旅游的真实性

民族旅游的一个重要属性就是真实性。MacCannell 认为真实性是可以根据历史遗留来构建的,并相信适当的舞台化不会丧失真实性^[25]。自 1973 年 MacCannell 提出“舞台真实”(Staged authenticity)理论,民族旅游的真实性已成为西方旅游学者们关注的热点之一。Stevenson 研究塔希提岛(Tahiti)的 Hevia 传统文化节庆,他发现此传统文化活动所呈现出的面貌就如同 MacCannell 舞台化真实性理论所述,此文化活动在旅游布景中以舞台化方式呈现^[26]。Matheson 以商业化的凯尔特(Celtic)音乐节为对象,研究真实性与其中的社会关系,他建议音乐节中社会关系的后台区可区分为三:首先是在模仿的环境中参与“真实”的文化,其次是透过演奏乐器或演唱,最后则是增强社会关系网络。此外,旅游商品化的过程无法借由社会空间的后台来达成真实的社会关系^[27]。Connell 研究坦纳岛(Tanna)的旅游时,发现游客虽然对瓦努阿图(Vanuatu)文化没有深刻的认识,对真实性也有许多不同的印象,但他们认为塔纳民俗村的表演缺乏真实性,因为他们看到村民真实生活的“后台”,并以此来进行比较^[28]。

3) 民族旅游中的“主-客”关系

“主-客”关系,即旅游者与当地居民之间的互动关系。虽然在主客交往中,旅游者与当地居民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但是更显著的是这种交往过程对当地居民产生的影响,这也是“主-客”关系研究的主要内容。Smith 最早对旅游活动中的“主-客”关系进行了多方位的探讨。近 20 年来,国外学者把“主-客”关系摆在了显要的位置。van Den Berghe 对民族旅游者的偏见进行了分析,指出旅游者一般都生活在自己的文化罩中,只能委屈土著居民来适应旅游者^[29]。Anastasopoulos 认为旅游本身既不能导致偏见的自动消除,也不会自动促进社会关系的改善,旅游仅仅为社会接触的发生提供机会^[30]。拉克森(Laxson)通过对土著

美国人文化博物馆和印第安人村庄纪念点的考察,从白人旅游者的角度,分析了白人旅游者和美国印第安人的交往关系。拉克森认为,白人旅游者和土著人相互持有自己的文化原型和世界观;在诸如民俗旅游这样短暂的交往中,因为文化原型的作用,旅游交往不能增进文化了解;恰恰相反,短暂的交往加剧了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倾向,使主客双方更加认定自己所持的世界观的正确性^[31]。Moscardo 和 Pearce 通过对澳大利亚土著文化园 1500 多名游客的调查,指出民族旅游者在进行旅游产品选择时,一般会在自己期望的接触程度与东道主带来的不舒服感之间寻求平衡^[32]。Goldberg 研究了为游客所设计的巫毒秀(Voodoo show)表演,发现游客与巫毒秀的表演者对此表演各有不同的定义与诠释,于是造成一种特殊的社会互动形态^[33]。

4) 民族旅游对目的地的影响

民族旅游对目的地的影响一直是国外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综合观之,民族旅游对目的地的影响研究从经济、环境、社会文化 3 个视角出发,分成正负影响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从负面影响来看,Kottak 通过对一个巴西渔村的调查,认为大量度假家庭、钓鱼爱好者等的涌入使人们的公社生活遭受全面破坏^[34]。Greenwood 探讨了“地方文化”作为一种旅游商品活动对东道地所产生的影响,如对传统的破坏等^[35]。Dyer 通过对澳大利亚 Djabugay 土著人的调查,认为由于经济基础差、缺乏资金投入,旅游业的经济收益很大部分都被外来投资者所获取,土著人获得的收益很少^[36]。

从正面影响来看,Jamison 通过对肯尼亚 Maislands 地区的调查,指出旅游业的发展为当地各种族、各民族提供了更多的合作机会,种族关系、民族关系有所缓和^[37]。Adams 认为尼泊尔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夏尔巴人并没有向通过旅游一步步渗透进来的资本主义力量屈服,而是成功地把新的生产方式融进了旧的生产关系模式中,当地人民之间的互助协作关系和雇佣劳动关系同时得到了加强^[38]。

旅游人类学对民族旅游影响的研究有一个不断深入、完善的过程。在《主人和客人》第一版中,Nunez 就指出,不能把所有的变化都归因于旅游开发,同时研究旅游影响要考虑接触双方的情况^[39]。瓦伦·L. 史密斯(Valene L. Smith)指出,不同的游客类型造成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融入目的地社会、文化、生活的情况不一样^[40]。

1.2.2.2 乡村旅游研究背景

从乡村旅游研究背景来看,20 世纪 50 年代后,真正意义上的乡村旅游因其在国际旅游市场中显示出的巨大潜力和在乡村重建中的社会、文化、经济作用,不仅成为了世界旅游组织(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UNWTO)关注的焦点,